

新人文

隐匿的 整体

程巍

自选集

河南大学出版社



新人文

隐匿的 整体

程巍

自选集

河南大学出版社·开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匿的整体:程巍自选集/程巍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4
(“新人文”书系)

ISBN 978-7-81091-950-0

I. 隐… II. 程… III. 文学研究—外国—文集 IV. 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5113 号

责任编辑 谢景和

责任校对 默 茗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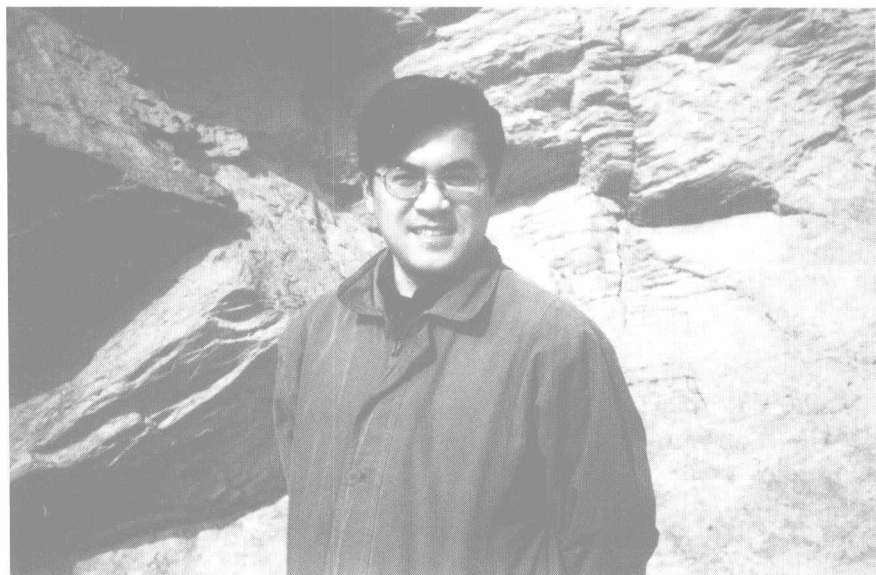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1.75

字 数 536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作者像

序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论语·阳货》

牛津第一位英国文学教授瓦特·雷利爵士(1904年任命)一向不大瞧得起自己的职业。大丈夫立身有正道，要么雄辩于议会、折冲樽俎于列国或征战于疆场，要么兴办实业或从事发明创造，以此为国效力，即便投身学术，亦当驻足于政治学、哲学、法学、历史、古典语文学等更男子气也更专业的学科领域。可英国文学算什么正经玩意儿？那不过是一堆飘忽不定的用谁都会说的英语所表达出来的意象和感觉，是英国妇女和下层阶级爱不释手的東西。而且，最早的英文系设立于英国的前殖民地美国和当时的殖民地印度(1885年秋，雷利爵士被任命为印度英东学院首任英国文学教授)，是英国向其前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人提供的一种简便的英国人文主义教育，而牛津自身的古典人文主义传统则以希腊文和拉丁文典籍为本。如果一位牛津教授也像女人似的整天泡在英国诗歌和小说中，大谈什么幻想、感觉和体验，那别说一般严肃的牛津学者会说些不中听的话，即便自己也会有一种学科身份危机感。

“一个年轻人若想找到这么一个团体，那里人们只谈感觉和体验——而且是以信口开河的方式——那大概非文学院莫属。”1921年1月11日，雷利写信给同病相怜的乔治·戈登(牛津另一个英国文学教授)，自嘲道：“上帝宽恕我们吧！如果在末日审判的那一天，我被控教授文学，我将申辩道，我从来没有把它当真，不过为稻粱谋而已。”好在1914年爆发了世界大战，把雷利爵士从英国文学研究中拯救了出来。他迫不及待地投身于战争宣传，尤其关注这场战争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的作战方式——空战。有意思的是，这位英国文学教授写得最好的著作竟是《空战史》(第一卷)，而他在英国文学学科史上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反倒是他对英国文学研究的冷嘲热讽。

不过，让他意想不到的，这次大战及其激发出来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却使此前一直遭到轻视的英国文学研究突然蔚为大观，成了一项其重要

性丝毫不亚于政治、外交、军事和实业的伟业。它不再是女人们在喝下午茶时的浅薄话题,它变得深奥了,专业了,并形成了“文学知识分子”这个声势显赫的群体。它雄心勃勃,声望飙升,甚至开始挤压其他专业学科,这导致1950年代末C. P. 斯诺向剑桥英文系及其掌门人F. R. 利维斯发难,由此拉开“两种文化”的旷日持久的大辩论,至今余音未绝。它当初的那些弱点——如诉诸英语语言文字、情感、无意识、体验、想象,是英国普通民众的读物,等等——如今反倒成了它的力量之源,被用来磨砺英国人对本国语言的敏感,激发英国人对本国的制度文物和山川草木的热爱,培养英国人的民族自信和骄傲,塑造英国人的民族身份认同,最终促成英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和巩固。英国文学研究的兴起,与大型英语词典的编撰同时(如*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通译为《牛津英语大词典》,但译作《牛津英语词源》更能体现其“历史语义”的编撰方针,其最初出版的十大卷原名为*New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都是这一时期英国民族主义在语言文学上的产物。

民族文学之所以能承担如此重大的作用,在于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生活世界”,深深扎根于男男女女的日常语言、经验、历史记忆、意识、情感、梦想、无意识和非理性之域。阅读行为看起来是某个人临睡前读几行诗或几页小说,其实也是他变成以赛亚·伯林所说的“群体个人”的过程。当英国作家乔治·吉辛在他的随笔集中反复感叹“英国的小牛肉是普天下最美味的小牛肉”时,他不是在描述一个事实,而是在表达一个英国游子对于故土的怀念,这就像F. R. 利维斯那一代英国文学学者,当他们以显微镜的方式来细察英国文学时,总是能从其字里行间发现英国作家在美学和道德方面的特别的敏感。阅读英国文学,就是对自己的美学敏感性和道德敏感性的磨砺。每一页英国文学都变成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意义旋涡,读者不知不觉卷入其中,而这个旋涡的底部通向“英国特性”(Englishness)这条浩瀚的民族性暗河。每一次阅读行为,都使大不列颠人更接近“英国人”(English)这重被构建起来的民族—政治共同体身份。在1917年,苏格兰人伊安·黑伊曾出版一本题为《被压抑的英格兰人》的小册子,其中写道:“当一个苏格兰人说到苏格兰时,他指的只是苏格兰。当一个爱尔兰人说到爱尔兰时,他指的只是爱尔兰,不是别的地方。但当一个英格兰人说到‘England’时,他指的可能是苏格兰、爱尔兰,或者甚至是加拿大!这种想当然地把英格兰当成整个帝国、把整个帝国当做英格兰的好玩的习惯,并不总是有利于帝国诸邦的手足之情,尽管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它根本无意冒犯谁。”但英国语言文学

研究的重任之一，就是将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英格兰人或大英帝国人塑造成“英国人”。

这在后来引起了诸如威廉斯和伊格尔顿等一批左派批评家的不满。他们从小熟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磨砺了自己的政治敏感，而且，他们是英国文学的行家。但与 F. R. 利维斯那一代英国文学学者不同，他们把得自英国文学研究的对文本的敏感性用在政治解读方面，在每一个节点上阻击英国文学的表述。经过他们的批评利刃的分解，在过去几代人那里一直被当做圣物一样供奉起来的英国文学变成了一堆有罪的意识形态，支撑的是阶级统治和殖民统治的秩序。在同一个方向上，但在不同的领域，法国的福柯、布迪厄和美国的萨义德从事着几乎相同的工作。布迪厄在他的一本书中告诫他的读者，若要摆脱那种“视语言为沉思之物而非行动和权力的用具”的社会哲学，“就必须牢记交流关系——语言交往——也是象征权力的关系，交谈双方或其各自所属的群体的权力关系在其中得以实现”。

文学批评的事业于是转而与自由和解放的政治事业息息相关，而每一次批评行为都变成了一次精细的政治训练，其目标是为了形成一种更为复杂和精致的政治文化。一种成熟的政治文化不仅体现为人们乐于谈论政治，更体现于人们能从日常生活中发现权力关系的种种更为精致的难以察知的存在形式。没有比一种粗糙的没有扎实的理论根基和深厚的感性基础的政治文化更糟糕和更危险的了，因为这种政治文化之中的人，无论激进派，还是作为其对立面的保守派，其实都处于同一种思维和话语水平。一种粗糙的政治文化的逻辑现实就是一种粗糙的政治，其特征是大词、全称判断和逻辑跳跃的流行。那是法国大革命式的政治话语方式。但政治不是诗，它是一个复杂的综合工程。

当初，文学形式主义批评家为文学自主性辩护时，曾高喊“文本之外空无一物”，如今的批评家可能会说：“文本之内应有尽有，因为内就是外，外就是内。”面对象征与权力的这种关系，面对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他已厌倦了充当风花雪月的审美家的角色，而且认为文学批评若沿着形式一途走下去势必使文学批评变成无足轻重的东西，正如他拒绝充当义愤填膺的道德家的角色，认为文学批评沿着道德一途走下去势必使文学批评变成一种道德压迫。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轻视文学形式主义者对于人们的形式敏感性的磨砺，正如他不会忽视 F. R. 利维斯式的道德批评对于人们的道德敏感性的培养，但光有这些还不够，还必须具备一种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并且将一切纳入政治的解读之中。具备了这些，他才能像一个极有专业素质的侦探，潜入

流光溢彩的文学文本的昏暗的字里行间,从中发现权力或意识形态的蛛丝马迹,并寻找它们与现实权力体系或者不同政治利益之间的构成关系,因为文学文本不仅“再现”,而且不断“再生产”——在一代代读者那里再生产出它所需要的那些东西,并使之沉淀于人们的无意识,成为一种意识控制。于是,文学批评变成了批评思维的一种综合训练。

批评事业宛如双面刃,它在分解各类统治神话的同时,也伤及了“核”,产生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离心力。批评家一方面要警惕权力的滥用,另一方面,还“必须保卫社会”。

本集的论文部分主要涉及 19 世纪初到 20 世纪的英美文化史和文学史。仅从国别上说,英美文化和文学(或者说西方文化和文学)才构成一个与中国不太相干的他者,但当它们被译介到中国时,就渐渐脱离了它们特定的历史语境和权力场,被浪漫化了,暗中转化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内在部分,甚至其中一些已沉淀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这当然不总是一种无偿的文学馈赠,因为其中夹带着基于英美社会自身的小至阶级利益、大至国家利益的“再现”。当我们仅仅带着文学的兴趣去阅读它们时,就极有可能无意识地在自己内心“再生产”这些价值并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战斗精神的西方中心论者,视本国的典章制度、文物衣冠为野蛮丑陋之物,欲付诸一炬方能解心头大恨。

西方中心论者并不见得非是西方人,黄皮肤的西方中心论者也比比皆是,而且,他们率尔操觚、鲁莽灭裂的话语风格甚至令白皮肤的西方中心论者都觉得难为情。于是,当英美文学在其本土遭到左派批评家的系统清算时,它通常能在其遥远的文化殖民地找到自己忠心耿耿的崇拜者。对比一下当今英美两国大学的英文系与中国大学的英文系(中文系何尝不是如此),就会发现,那些在其本国已流离失所的文学幽灵们依然端坐在“英东学院”的神龛里,接受“远东”的一批批年轻学子们的膜拜。

本集的论文部分亦编入了三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论文——中国现代文学,这也是这些幽灵徘徊不去且施加统治的场所,只不过换上了东方的装束和面孔。但批评的任务是祛魅,而不是收留和供奉幽灵。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在随笔部分亦将一篇有关中国当代电影的随笔置于那几篇有关“美国社会与文化”的随笔之后。无疑,这些论文和随笔都是我在上面提到的那种“综合训练”的尝试,而最好的训练方式是“案例分析”。我将这些论文和随笔视为磨砺自己的美学、道德和政治的敏感性的一个过程,其粗糙、笨拙、错

谬之处还望方家不吝赐教。

收在本集中的这些文字,均发表于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前八年,此次为了结集出版,其中一部分做了一些或大或小的修改。大修改仅止于论文部分,这是由论文自身的性质所决定。所谓“学术的进步”,套用钱锺书的一个比喻说,当制伞的技艺已成为一种常识时,再用几根棍子支撑一块布就很难说是一种发明。至于本集的随笔部分,时间所限,我只做了为数不多的几处修改,由于时光荏苒,物是人非,个别当初在旧作中出现的活生生的人此刻已成古人,我亦尽可能补充一些后续细节;而小说部分则几乎原封不动,它们的笨拙常使我怀念一个已经遁去的溺于幻想的时代。

目 录

序	(1)
---------	-------

论 文

伦敦蝴蝶与帝国鹰：从达西到罗切斯特	(3)
清教徒的想象力与 1692 年塞勒姆巫术恐慌 ——霍桑的《小布朗先生》	(37)
《汤姆叔叔的小屋》与南北方问题	(57)
盖茨比与“地下商业帝国”	(82)
霍尔顿与脏话的政治学	(104)
阐释《爱情的故事》，或 1968 年造反学生分析	(119)
圣殿与鼯鼠：英文系史论稿	(140)
墙或塔：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梦	(216)
蔡元培的“辞职启事”	(246)
为林琴南一辩：“方姚卒不之路”案的大政治与小政治	(269)
现代性与东方情调 ——析张爱玲《倾城之恋》	(313)

随 笔

“美丽的绿苍蝇”与反淫秽物品法	(333)
“赞助行动”及其法律问题	(338)
犹太复国主义者伯林的想象力	(347)
对两起谋杀案的审判	(356)
他人之痛的见证	(367)
两种想象力 ——评《乱》与《英雄》	(377)

小 说

木樨地桥	(389)
雪地上的图案	(400)
屋顶上的巴黎	(420)
敞向草坪的窗口	(452)
后记	(495)

论 文

伦敦蝴蝶与帝国鹰：从达西到罗切斯特

在追寻达西和罗切斯特这两个男性文学形象分别在 1813 年和 1847 年的对应历史群体原型前，我想先谈一谈流行于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妇女中的写作癖或“蓝袜子的涂鸦搔痒症”（伍尔夫语）。这不仅因为《傲慢与偏见》（1813）和《简·爱》（1847）的作者从属于这个庞大的阅读和写作群体，还因为这个群体在不同时代对男人的想象分别为她们的写作提供了灵感。

我将说明英国中产阶级妇女的欲望的一种变迁：1813 年她们倾心于达西这类高雅而冷淡的纨绔子（dandy），而到了 1847 年前后，这类男子却被她们冷落，以罗切斯特为理想人物的另一类粗野而热情的男子取而代之。在英国中产阶级妇女欲望的变迁下，是英国社会对“理想男子”的要求的变迁，简·奥斯丁和夏洛蒂·勃朗特不过把这种关于“男子气质”（manhood）的美学/政治要求带入了文学想象。

每个时代都会为本时代的理想的“男子气质”给出自己特定的定义。它看起来是一个美学的或者心理学的概念，并因此只与个人有关。但美学和心理的形态的变化无非一个时代的政治、权力、外交、经济和阶级关系等社会性变动的一种映射，是一个时代的占有文化领导权的阶级、阶层或社会群体对自身形象的正当化和普遍化的象征表述，同时，它又带有意识操纵的特征，反过来在真实生活中塑造合乎这类理想的男子。在此，文学的“创造”蕴涵了两种意义：它是作家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文学文本，同时，它又在现实生活中创造出实实在在的人格类型。当我们按照自己所处的时代关于“男子气质”的流行定义来塑造自己，或——正好相反——拒斥这一定义时，我们就在不自觉地分享这个时代的某个阶层、阶级或者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

不管有意或是无意，奥斯丁和勃朗特的文学行动都构成了她们各自所属的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并且为她们各自笔下的理想男子及其现实对应阶层提供了充足的美学价值和道德合法性，而这反过来又影响了现实中的人的美学和道德的选择，把自己塑造成那个时代的理想人物，

并对不愿或无力按照这种要求来塑造自己的人和群体形成一种美学的、心理的以及政治的压迫。这一过程就是对象征资本的争夺和控制的过程。文学作品不仅反映现实,而且塑造现实,就这一点而言,它既是消费性的,又是生产性的。在1813年,《傲慢与偏见》的热心读者觉得模仿达西高雅而冷淡的伦敦上层社会的方式说话、着装、举手投足,是一种能够获得象征资本并进而获得社会尊敬的时髦;但到了1847年,中产阶级的男人们感到《简·爱》中的罗切斯特的那种具有外省风格的粗野而充满激情的言行举止更合乎他们的口味和时代的要求。

这几十年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社会变动,以致前一个时代的理想男子在下一个时代遭到了社会性的贬低?一方面是因为英国社会内部两个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从政权和经济领域进入象征领域,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在经历了它的全球战略收缩(如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后开始再次转向全球战略的扩张(以自由贸易为名义的殖民扩张)。这两方面大致构成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或者象征/权力的互动关系。

揭示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丝毫不减损奥斯丁和勃朗特在文学上的个人创造性,她们都是自觉的文学现实主义者,而文学现实主义者的最大成就,就是再现时代的一般心理特征——但对研究者来说,则不仅要揭示这种一般心理特征,还必须将它再度外在化和历史化,将其还置于由国内政治、权力、经济、阶级意识、象征形式以及国际局势等各个互动层面所构成的动态社会结构中。

1

“18世纪末发生了一种变化”,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回顾英国中产阶级妇女的写作史后,颇有感触地说,“如果让我来重新撰写历史,我将把这种变化描述得比十字军东征或玫瑰战争更详尽,赋予更重大的意义。这个变化是:中产阶级妇女开始写作了。”^①不过,她把中产阶级妇女的写作动机,阐释为获取个人经济的独立。她对文学妇女说:“用你的智力一年可挣五百英镑。”^②这大致相当于伍尔夫发表这篇题为《自己的一间房子》的演讲的1928

① Virginia Woolf, *A Room of One's Own*,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31, p. 97.

② Virginia Woolf, *A Room of One's Own*,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31, p. 99.

年一个中等生活水准的伦敦佬一年的开销。她的看法基于她自己以及像她一样的英国文学妇女的状况：长子继承权（迟至 1925 年才被废除）和儿子优先女儿的继承原则剥夺了她们的经济来源，而如果她们的婚姻又不幸被延迟，甚至被耽搁，无法通过婚姻获得生活保障，那么，写作就成了唯一的谋生之道。伍尔夫的说法更适合奥斯丁的时代，因为那时英国社会没有为中产阶级妇女提供什么“体面”职业。妇女的职业主要是女仆和女工，而这是下层妇女的职业。

摄政时代（乔治四世摄政始于 1816 年，但史家一般都将 1800 年到 1830 年统称为摄政时代）的中产阶级妇女瞧不起这些职业，在她们看来，“工作”意味着“不体面”。她们被迫或自愿局限于家庭，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而写作是唯一既可足不出户又能获得收入的体面职业。到勃朗特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出现了另一种妇女职业，即家庭或初级教育机构的女教师，吸引了中产阶级中下层少数妇女进入“社会”。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复兴的清教主义赋予“工作”以一种高尚的伦理意义，扭转了摄政时代更贵族化的对待工作的态度。

从 1813 年到 1847 年，英国发生了一连串事件，先是拿破仑战争，然后是摄政时代伦敦纨绔子反资产阶级“粗俗”的斗争，最后是维多利亚时代在工商业、殖民地和海外贸易方面的再度扩张。这一连串大事件，把英国男人大部分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引向了非文学方面，又没给英国中产阶级妇女留下一片可以施展才华的社会舞台。这是英国男人形成自己的“manhood”的自恋时代，中产阶级妇女受到忽视，发现自己唯一可以施展才华的地方，只剩下家庭。可即使在家庭，她们也被闲置起来，处于伊安·瓦特所说的“被强加的闲暇”中，因为家里的男仆和女仆已使她们从家务中解脱出来。

“被强加的闲暇”还有悲剧性的一面：中产阶级妇女总是成为“婚姻市场”昂贵的滞销品。这一时期，考虑金钱和门第，中产阶级妇女不会下嫁给下层男子，而中产阶级男子也面临同样的经济压力，除继承父亲财产的长子外，其他儿子不得不自谋生路，经过漫长的个人奋斗获得稳定的经济来源后，才娶妻生子，而这时往往年过而立。长子继承权是为了确保家族的地产和房产的不分割，以维护贵族土地所有者的权势，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不劳而获的由长子构成的社会群体，而只能获得一些诸如母亲的首饰或者一套银餐具等“动产”的次子们如果不想沦入贫困，则必须外出工作，自立门户，而发家致富的最好途径是去海外从事殖民战争或者殖民贸易。“进取”精神因而主要表现在次子们身上。假若说摄政时代是不劳而获的长子们从美学和

道德上压迫次子们的时代,那么,维多利亚时代则是心怀不满的次子们力图扭转长子的美学和道德统治并为通过个人努力发家致富的资产阶级精神正名的时代。长子继承权在把长子“贵族化”的同时,也将次子们变成了为财富而奔走并具有侵犯性和扩张性的资产阶级。

此外,中下层中产阶级男子经常在颇具姿色的女仆或女工中寻找妻子,而这样就耽搁了相应数量的中下层中产阶级女子的婚姻^①。再就是拿破仑战争、殖民地战争以及海外贸易,使大量年轻男子(无遗产可继承的中下层社会的男子以及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大户人家的次子)长久地离开了英国,其中一些再也未能回来,这也造成了成年男女比例的失衡。尤其是对于摄政时代的中产阶级妇女,特别是那些能写会读的知识妇女而言,还有一重很少为研究者所注意的原因加重了她们中的部分人的婚姻障碍,那就是伦敦纨绔子的时髦刊物和小说造成了一种对于中产阶级形象的普遍贬低,使得一些有才貌的中产阶级年轻女子不愿屈就与同阶层男子的婚姻,而无休无止地幻想和等待着某个达西似的年轻绅士将自己从粗俗的资产阶级家庭和交际圈中带走,而这一等,常常就把自己等成了再也无人问津的老处女。

这导致了两个后果:首先,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妇女的婚姻被耽搁了。这一时期在中产阶级家庭出现了数量惊人的老处女,甚至,到19世纪80年代,这一状况仍然触目惊心。“老处女”成了这一时期文学中不可或缺的形象,经常是小说的年轻女主角的某个姨妈或者舅妈,有那么一点感伤,又有那么一点滑稽。“大量的妇女从未结过婚”,F. M. L. 汤普生说,“例如,在1881年,英格兰年龄在四十五到五十四岁之间的妇女,百分之十二从未结婚,在苏格兰,是百分之十九。”^②这个统计数字没说明在中产阶级妇女中间,这种现象更突出,因为下层妇女有更多机会接触男性,如在工厂里,而且她们的婚姻态度非常现实,不指望嫁给另一阶层的男子。她们基本上是在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里寻找丈夫。

另一个后果是:更多的中产阶级妇女虽然结了婚,可结婚年龄被大大延后。下层妇女在二十五岁后结婚,会被认为是晚婚,而中产阶级妇女却经常在二十五岁后才结婚。“1825年后,不识字的人比识字的人结婚更早,尤其

^① F. M. L. Thompson, *The Rise of Respectable Society: A Social History of Victorian Britain, 1830-190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95.

^② F. M. L. Thompson, *The Rise of Respectable Society: A Social History of Victorian Britain, 1830-190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52.

是不识字的妇女。”哈维·J. 格拉夫说,“不过,史料证明,识字的夫妇比不识字的夫妇生育了更多的孩子。”对这种怪现象,他解释说:“也许,识字的妇女以高生育率来弥补自己的晚婚。”^①

这种弗洛伊德主义的解释,我后面将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分析,这里,只提供一个非弗洛伊德主义的事实,即女工的低生育率与其家庭和工厂的卫生条件有关,而且,由于女工生育后不久就得重返工厂,身体受到损害,影响了以后的生育,又因无暇照看婴儿,导致了婴儿的高死亡率。19世纪60年代后,由于经济压力、卫生条件、避孕方法的改善,中产阶级家庭的生育率也开始呈下降趋势,到这个世纪的末期,家庭平均的孩子数目减到2.65个,比下层家庭的3.76个还要少。^②

不管怎样,从1813年到1847年,中产阶级家庭一般子女成堆。例如,加上夭折的孩子,奥斯丁家有7个孩子,勃朗特家有6个。在这些女儿成堆的家庭,谈得最多的是如何猎获门第高贵的贵族青年,以及——退而求其次——富有的中产阶级青年。这成了每个待字闺中的中产阶级女子最热烈的幻想和最伟大的事业。可这并不容易。例如,奥斯丁的婚姻就被彻底耽搁了,正如勃朗特的妹妹艾米莉和安妮,而还算幸运的勃朗特也迟至三十八岁才结婚,婚后不久,身怀六甲的她就因病而“带着未能做成母亲的遗憾和对丈夫的深深的眷恋”去世。可以说,在这个伍尔夫所说的妇女的“史诗时代”,大部分文学妇女的婚姻要么被耽搁,要么被延后,使她们面临漫长而无趣的闺房岁月。如果不想沉溺于庸俗消遣,那么,阅读和写作就成了唯一高雅的消遣。何况,这种消遣还有这么一个好处,可以在幻想中获得在现实中错过的理想婚姻。

还必须弄清她们文学修养的来源。在奥斯丁和勃朗特所处的时代,英国虽有牛津、剑桥两所大学,但只招收贵族及中产阶级男子,中产阶级女儿只能在初级或专科学校接受教育,课程无非音乐、绘画、识字和缝补(到勃朗特时代,增加了地理课,我在后面将分析其意义),如罗切斯特讥讽的那样,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目的是培养高雅的家庭主妇,而不是有一技之长、自食其力的社会人。甚至,摄政时代保守的托利党人在反对城市工业文明时,也

① Harvey J. Graff, *The Legacies of Literacy*,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20.

② F. M. L. Thompson, *The Rise of Respectable Society: A Social History of Victorian Britain, 1830—190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60—70.